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浅论周恩来的包容思想

■徐晓虎 徐竹昕

一代伟人、开国总理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明清以来，淮安是沟通南北漕运的交通“咽喉”，运河线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它所具有的中国地理、文化等“南北地理分界线”的要素，对周恩来童年少年成长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推动周恩来逐步形成“开放进取、兼容并蓄”的包容思想。

一、周恩来的包容思想来源于故乡淮安的人文、气候特征，为其一生发展打下重要的思想基础

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3月5日。他的故乡淮安位于横贯中国东西的“秦岭—淮河”一线。淮安因淮河而得名，表达了当地百姓期待淮河两岸风调雨顺、一方平安的美好愿望。在2009年中国地理学会发布的30项“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中，中国地理学会首任会长张相文提出的“秦岭—淮河线”名列第一。有关学者进一步指出，“淮河—秦岭线”不单纯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还是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

淮安正位于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上。这条分界线不仅是中国地理、气候的南北分界线，还是中国人文、文化、民俗的南北分界线。明清时期，淮安成为著名的“南船北马”之地，向南则坐船，向北则骑马，清江浦和河下则是南来北往过客的必经之地。周恩来出生于淮安县城内的驸马巷，紧邻漕运总督衙门、淮安府衙，幼时常在河下古镇游玩，少年时期曾在清江浦主城区生活学习。无论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的独特地理位置和文化特征，还是“南船北马”带来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都在童年周恩来的成长过程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促使他形成“开放进取、兼容并蓄”的包容思想。周恩来之所以能成为举世公认的一代伟人，与淮安这方水土的孕育培养密不可分。

二、青少年时期，周恩来的包容思想体现在适应各种环境，善于团结他人

周恩来12岁离开淮安，此后再未回

乡。他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学习经历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在那里，周恩来很快适应大城市的多元化生活和一流学府的开放氛围，开始积极参与“演说会”，与几位同学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组织青年学生开展演讲、辩论等活动，鼓励引导同学们在健康的社交活动中交朋友。他还在天津创办“觉悟社”，主办杂志《觉悟》，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周恩来在南开的杰出表现及优良品质得到张伯苓、严修的充分肯定。

年轻的周恩来包容大度、友好待人、热心公益，结交了众多感情真挚的朋友，他们对周恩来赴国外留学给予了大力支持。1917年，周恩来赴日本留学，从日本回国后，得到严修的大力支持，又获得去法国留学深造的机会。周恩来在西欧国家学习生活工作达三年半之久，这段经历让他有了全球视野和国际化思维，并对他后期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周恩来在青年时期先后赴日本和欧洲游学，很早便具有长远眼光，他的战略思维和宏观视野在第一代领导人中非常突出。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秉持求同存异、共存共荣的理念。

三、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的包容思想体现在顾全大局、谦虚忍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建党建军初期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始终坚持包容开放的理念和行为方式。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周恩来始终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善于用自我批评的方式化解矛盾、弥合分歧、维护团结。

在革命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周恩来的包容思想体现在灵活多变的领导艺术和管理方法上。1929年2月，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了著名的“二月来信”，特别要求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但在指导具体工作时，发现其中部分内容与实际情形有出入。面对有关方面的质疑，作为当时党内最高军事领导人的周恩来，以民主作风和宽容态度，认可了其中的一些观点，并立即进行自我批

评，调整相关内容。当党的领导层出现意见分歧时，他展现了善于调解党内矛盾的卓越才能。

在1942年2月到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周恩来表现出了过人的宽容大度和博大胸襟。从1943年11月15日起，周恩来在整风学习会上连续五天作报告，检讨自己的失误和不足。周恩来在自我批评的同时，还努力保护别人。

抗战时期，周恩来代表我党长期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他充分运用自己广泛的人脉资源和善于协调的卓越风范，开创了我党统战事业的新局面。周恩来始终坚持“外柔内刚、留有余地”的包容式工作模式，在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的包容思想体现在因势利导、统筹谋划上，为中国发展寻找平衡点和突破口

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即担任政务院总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任劳任怨、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对于他这一阶段的辛苦工作，很多老同志在回忆录里作了客观记录，可周恩来总理始终把自己当作普通劳动者、当作人民公仆。

周恩来曾称自己“天性富于调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善于在各种矛盾中寻找平衡点和各方，确保党和国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周恩来曾数次提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彰显了他为国为民、战至最后一刻的信念。中美“乒乓外交”，通过乒乓球实现中美外交谈判，可以说是小球转动大球的成功之处，是全世界叹服的创举，也是周恩来总理的重要外交成果。

(作者分别为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淮安市人才发展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周利丽 周一峰

当前，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尺。文化产业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物质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后，其需求必然向精神、文化方面转移。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文化产业则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

淮安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淮安文化产业正逐步成为淮安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支柱。“十三五”期间，全市文化及相关产业产值从2016年的129.75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40.49亿元，增长8.3%，占地区生产总值的3.49%，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板块。总体来说，淮安文化产业“十三五”期间已初步形成以包装印刷、文教工艺与娱乐用品制造为主的制造业，以生态休闲、运河文化、主题公园为主要文旅融合形态的文化旅游业，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科技、创意设计等新业态发展基础。同时，淮安将文化产业发展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重头戏，编制完成《淮安市“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重抓产业研究，编制完成《淮安文化产业发展白皮书(2021)》；重推政策扶持，出台一揽子金融政策，助力文化企业发展，建成西游等一批实力强劲、卓有成效的文化企业。据统计，近年来，淮安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数量持续增长、总量不断扩增，营业收入等指标增速全省领先。2022年，紫金文创研究院牵头组织评选出淮安市首批5家“小巨人”文化企业、10家瞪羚文化企业和10家雏鹰文化企业。

淮安文化产业发展优势：一是文化资源优势。“伟人故里、运河之都、美食之都、文化名城”是淮安最具特色的四张城市名片，淮安自然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丰厚的文化底蕴。二是区位优势。淮安交通等基础设施良好，具有衔接、跟进相关文化产业的现实能力。三是城市发展优势。近年来，淮安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捷泰新能源高效太阳能电池片、巨石碳纤维智能制造等百亿级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将为淮安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为淮安发展文化产业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也必将进一步激发城乡居民文旅消费潜力和文化消费市场活力，点燃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引擎。

淮安文化产业发展短板：文化产业规模偏小，文化遗址、历史名人、特色工艺、美食、曲艺等代表性文化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开发利用，“名人效应”尚未得到有效凸显，淮安名人背后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号召力亟待通过现代展示及体验技术进行提升。一些文化企业创新机制不足，缺乏一定的市场竞争力及优秀的管理人才、经营人才和产品研发人才。

淮安文化产业面临的机遇：一是国家战略的重要选择。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政策红利下，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抢抓淮河生态经济带、大运河文化带等重大战略叠加所带来的机遇，“文化”和“生态”作为我市的资源优势，未来将得到进一步释放。二是自身发展的推动需求。作为开放晚、起点低、基础薄弱的经济欠发达城市，文化产业的特殊性使其成为实现“十四五”时期淮安科学跨越发展的重要战略载体。三是文化消费的市场机遇。随着淮安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产品逐渐成为消费主流，文化市场潜力将得到充分释放。面对的挑战：一是文化产业尚未形成规模，需要较长时间来改变。虽然淮安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但经济基础较薄弱，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起步阶段。二是文化产业需要市场化，但文化资源不能过度商业化。文化资源需要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否则将导致文化资源的浪费。比如，资金短缺使得一些优秀的文化项目得不到开发，因缺乏优秀人才而制约发展、人才的发现与培养周期较长等。

淮安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定位。基于对淮安内在文化资源要素和外在品位特征的深入分析，淮安要注重文化产业发展与资源开发、旅游业发展有机结合，大力弘扬和发展具有淮安特色的创新文化、开放文化和亲民文化，依托名人名著、名湖名水、名菜名品等特色文化资源，加快重点文化旅游景区景点建设，培育壮大文博会展、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以文化产业发展为推动增量提质、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加快建设“文化淮安”。因此，实现“十四五”期间的发展目标，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创新体制机制，解放文化生产力，提高淮安文化实力，推动产业链延伸、产业集聚和产业链协同发展。在做大做强现有文化产业的同时，重点推动核心文化产业市场化、传统文化产业国际化，抢抓新兴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机遇，推动淮安文化产业跨越发展。

淮安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的对策建议。首先，要优化文化产业的结构和布局。文化资源配置不合理、产业规模实力不强，是制约淮安文化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根据淮安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要求，加强文化产业规划和政策引导，促进文化产业要素和相关文化企业集聚发展，打造多个文化服务集聚区，扩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层次，不断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其次，要发展重点产业门类。要把培育壮大骨干文化企业作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打造完善地方文化产业链条，夯实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通过大运河文化带、白马湖国家湿地公园等重大文旅项目建设，实现地方文化、文创产品、旅游生态等高度融合发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要有效扶持、有效整合已有的优势行业、优势产业，如包装印刷、户外休闲用品生产、休闲观光农业等，努力在“十四五”期间将这些行业培育发展成为淮安文化产业的先导性行业，为淮安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固、持久的驱动力。要积极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借助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培育文化创意产业，注重在新兴的数字文化产业等领域抢点布局，不断培育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再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强文化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建设，完善文化市场体系。积极培育一批新的文化业态，将文化与餐饮娱乐、度假休闲等进行深度融合，开发一批新的文化产品；加强与影视行业、抖音平台等合作，打造更多“大圣归来”、极限挑战等知名节目；培育引进一批文化产业人才，重点培养引进文化产业管理、经营、产品研发、推广等方面人才，为文化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分别为：市委党校、市政府办)

淮安文化产业发展与未来战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

■陈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提出多年，为使之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和“共同信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五大具体要求之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一个与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与转化的过程，在践行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最终实现文化自信自强，形成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

“讲仁爱”是价值基础

“讲仁爱”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精神根源，是仁政、和合、大同的政治理想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基础。现代社会、国家、个人的发展，必须以“爱人”“成己成人成物”为前提与目的。“仁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是“和谐”“公正”“敬业”“友善”的源头。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的精神，与现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理念有着一定关联，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仁”的基本要求就是要爱人、利人、助人，这与人的自私、利己之心是矛盾的。事事出于私心就不能爱、不能仁，所以，“无私是仁之前事”，离开“无私”这一前提就没有“仁”。仁爱的升华就是博施济众，这与我们今天所讲的为人民服务有内在的一致性。

“崇正义”“守诚信”是根本前提

“崇正义”“守诚信”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如果缺失正义和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本无从谈起，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崇正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一定是崇尚正义的国家，社会成员按照个人的社会角色自觉修行，善养浩然正气，以天下为己任，勇于担当，爱国敬业，信义至上。正义是诚信之本、友善之根，在弘扬民族精神和重塑价值体系的过程中，人们要遵循正义性原则，乐于奉献，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守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从古至今，中国民众都非常重视“信德”，诚信既是美德、官德之准则，又是社会各类群体和职业的道德修养，如武德、商德、师德、医德、医德等无不讲究诚信之德。当前市场经济对诚信建设是一把双刃剑，既会产生追求和推进诚信的机制，又会滋生逃避和背弃诚信的特殊诱惑。现代诚信建设不是对传统诚信的简单重复，而是在平等契约关系的基础上，努力使诚信关系更加普遍化、制度化。

“尚和合”是原则更是智慧

“和合”是中华民族先贤们在实践中孕育的智慧，作为一种文化传承至今，全面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及中国社会制度的建构与社会治理。和合精神承认万物不齐的现实，甚至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分歧和矛盾，但是它反对让这些差异、分歧和矛盾放任自流。如果那样的话，不同事物就无法结成一个个相对稳定、和谐的统一体，也就失去了各自良性发展的条件。世间万物有所不同是正常的，出现矛盾、冲突也是正常的。和合的价值就在于合作共赢，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协和万邦”作为处理国内国际关系的准则。

“尚和合”与“文明”“和谐”“友善”等价值观相通，都致力于促进社会进步与世界和平，保证人的幸福和个性得到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在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

下，才有可能发展和丰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重民本”“求大同”是最高追求

传统文化中的“民本”观念是一种政治伦理，是中国古人的道德追求在政治领域中的具体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民本思想与时俱进，有所发展，即转化为民主。民本思想强调君主或官吏要“为民做主”，而民主思想则强调“由民做主”，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治理模式。只有政治权力为民所有，人民通过特定的程序把政治权力委托给施政者，并且能够对施政者加以有效制约、监督，这种政治才是民主。

“求大同”理想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人类终极理想社会的理解与向往。大同思想涉及的不仅是一般的道德观念与社会关系，还强调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大同理想带有一定的空想色彩，但在提升国家软实力、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等方面的积极性、重要性仍然不可低估。它有助于我们审视、反思今天的社会生活，激发我们对美好社会的憧憬。马克思主义描述的共产主义也是一种理想：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极大提高；阶级对立和“三大差别”消失，是一个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能实现人类自我解放的社会；全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人人都可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从主观愿望或抽象人性出发提出的空想，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之上的，符合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的科学预见，这一理想的实现具有历史的、客观的必然性。

(作者为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